

宋大川 主编

北京考古史



东周卷

王继红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宋大川 主编

北京考古史

东周卷

王继红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序

记忆的历史,有着不同的“版本”,比如神话传说,比如民俗,比如历史文献,比如考古学遗存,等等。它们都记忆着历史,它们是历史记忆的不同“版本”。宋大川先生主编的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不仅是北京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发现与研究考古学遗存所认识的北京史。例如其中《史前卷》中的《附表》,即《北京史前考古大事年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史的历程,这就是北京的考古学史。因此,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考古学遗存所认识,或所表述的北京史,和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北京史的历程,即北京的考古学史,便是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所涵盖的内容。这也是此书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这两史各自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就一个人来说,也因时、因视角、因视点而异。我在此时此刻所要说的则是:

从北京的考古学史来看,我认为之所以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一靠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二靠考古学的实践,三靠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没有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不会有考古学。没有考古学,哪来的考古学实践?没有考古学实践,哪来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所以考古学要存在,要发展,就得做好考古学遗存即文物的保存与保护。

同时,应指出的是,考古学史既有横向延展的历史,又有纵向发展的历史。移用现有的或他人、异地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进行遗存的研究,即使有新发现,产生了历史的新认识,也只能称之为考古学的发现史。如果考古学仅停滞于这一层面,那么,它展现的历史,便只能算是考古学发现史,即考古学史中横向延展的历史。只有推进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考古学才能既出现横向的延展,又呈现纵向的发展。既有横向延展、又呈纵向发展的考古学史,才是全面的考古学发展史。这样的考古学发展史,应是中国考古学人的追求。当然,我希望北京的考古学人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更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的实践,虽是推进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创新的前提,但要实现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创新,则需勤于在考古学实践中增加一个“悟”字,这也是我对北京考古人的一点希望。

至于文物保护与考古学发展应当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个人历来主张应该是良性互动和推进考古学的持续发展。我们应知,只有持续的文物,才能有持续的考古学发展。因此,这两个持续当是我们的追求。从这十卷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认识的北京史

来看,一是我看到了北京考古学的成就,二是从当前文化建设来考虑,北京史本身确实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两三卷,也不是四五卷,而是长达十卷本的北京史。这篇幅巨大的北京史,体现了北京考古学成就的巨大。

这体现了北京考古学人巨大成就的北京史,引起了我们哪些思考?

一是要理解北京史,就得明白北京所处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环境。北京处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地当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交界处,是面向欧亚大陆的中国西半部和面向海洋的中国东半部的连接地带。这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两类地理环境的位置。

二是北京是猿人演进为现代人的地区,很可能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转化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地区。关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问题,暂无人涉及。因此,暂难言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问题。打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北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族群文化的文化品性,存在如下应注意的文化现象:

其一,从新石器时代起,可以认为北京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或任何一种族群文化,就其文化构成来看,都是以一元为主的多元谱系的文化结构,即杂种文化。这种杂种文化乃是不同谱系的文化杂交产生的。所以出现文化杂交,乃是文化碰撞与交流的结果。

其二,北京是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族群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和争夺的地带。有时,北京存在多种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的文化割据并存的局势。有时,北京局部地区出现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文化的更替。有时,整个北京地区出现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族群的更迭。同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族群文化延续时间之短,和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或同一族群文化更迭频率之快,乃是北京文化演进的一个特点。

其三,西周封燕,是北京历史上出现的大事。所以是大事,一是开始将北京纳入中国的政治版图,二是出现了政权和文化的新关系。西周早期,周王朝(或燕国)政治版图或政权统治所及,仅限于北京部分地区。在这部分地区内,文化则是多元的。到西周中期,燕国政治统治涵盖了整个北京。此种现象,相对于此前的文化“一本多元”来说,我们称之为“一统多元”,即政权一统,文化多元。直到春秋晚期,才出现了政权与文化的“一统一元”,即政权统一,文化一元。自此以后,这种“一统一元”和“一统多元”的更替,一直延续到现代,这是北京政治与文化的一个特点。同时,需指出的是,“一统多元”下不同文化或族群的居民,既存在聚居,又存在杂居的现象,就聚居和杂居关系而言,又存在大聚居、小杂居,大杂居、小聚居和聚居、杂居难分秋色等不同情形。这是北京“一统多元”政治与文化的另一个特点。这两个特点,是我们论北京史者必须纳入眼帘的。

三是北京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步伐,大致同全国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步伐一致,即经历了中国的北京、亚洲的北京和世界的北京三大时期。所谓世界的北京,说的是北京自明代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这使北京成为了世界的北京。除少数年代外,因为北京是这个时期中国的首都,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故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时的北京处于漩涡中心,走过的道路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迂回曲折。现在该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

了,该冷静下来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了。什么是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我以往讲的“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八个字。所谓“传承”,是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所谓“吸收”,是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所谓“融合”,是将这两种优秀文化融合起来,如“中体西用”、“中西之间”和“西体中用”等等;所谓“创新”,就是在“融合”的基础之上,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创造出新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乃是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这是被恩格斯所肯定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指出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在史前社会中就已存在,并呼唤在“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以“更高级形式”复活这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其实对中国来说,这种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文化,也不是什么舶来品,这种文化已经以初级的形式存在于我国古代的氏族制度中,不过在我国由氏族制度社会发展为文明社会的过程中逐渐被民本思想和更恶劣的专制文化代替了,除保留一点痕迹外,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尘封在历史的博物馆中。是恢复我们记忆的时候了!是从西方的文化中学习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的时候了!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来到中国大地时,中国文化的特色不会消失,而将如苏秉琦所说的那样,仍是世界文化中的一个相对独立区系,和世界文化的关系则如费孝通所讲,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此时中国文化方显出勃勃生机。

是以为序。

張忠培

12-4-22 成稿於小石橋

前 言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延续未曾间断的历史名城,有着数十万年的人类居住历史,3 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50年的建都史。漫长的发展岁月中这里积淀了极为广博深远的文化遗存,它们是北京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代表性文物遗迹,是数千年来北京从最初的原始聚落发展到今天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物证,而这些历史的印迹只有一部分见于文献典籍,绝大部分则尘封于地下,需要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去再现。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地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成绩卓然,展示了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构建和诠释北京地区社会发展历史与城市变迁历史方面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

如果从1927年周口店遗址的发掘算起,北京地区的史前考古已经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基本建立了北京地区史前考古的文化序列。周口店遗址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及猿人使用的石器和用火遗址,证实50万年以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其创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地区的史前考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继续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外,还新发现了一批史前文化遗存,获得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对推进北京地区早期人类及其文化演进历程的探讨具有重要作用。据统计,北京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石器出土地点约48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墓葬和零散遗存点约4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在北京城区和多个郊区,共同构建了北京地区史前历史发展的脉络,为认识北京地区史前文化结构和研究不同史前文化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北京地区的历史时期考古内容丰富,在反映北京文化内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北京地区三代考古的重大贡献是为西周初年封立“燕”、“蓟”二国及“燕”、“蓟”古城的探讨提供了实物资料。琉璃河遗址发现的燕都古城以及大量西周时期墓葬、车马坑和带有燕侯铭文的众多青铜礼器,印证了文献所载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和封召公于燕是信史,同时也弥补了文献记载的匮乏及不确定性,笼罩在北京古都城市历史起源上的迷雾正在廓清,“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愿望正在实现。而“玉皇庙文化”的发现则表明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北京地区始终存在着南北两个不同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即位于北京南部的燕文化和位于北部燕山山地间的“玉皇庙文化”。“玉皇庙文化”的发现独立地回答了文献资料所无法回答的历史问题,进一步展现了通

过考古学构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历史的可能。

北京地区秦汉及其以后各个历史时期也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对北京史的认识。北京地区秦汉古城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为研究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度和北京地区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增加了资料。北京地区城市考古调查与研究的开展,基本究明了北京名城各时代的历史发展系列。古蓟城、西晋蓟城、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等城市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为研究北京城市的发展演变和城市的历史、生活提供了大量极为重要的、科学的史料,考古调查与研究获得的有关城池、建筑、街巷道路、宫殿苑囿、手工业生产作坊、城市的河湖水系等的各种实物资料丰富了北京史研究的内容。

金代皇陵、明定陵、清代园寝等帝王陵墓考古所取得的诸多重要成果,使人们对陵园分布、陵园布局、陵寝建筑、陵邑形制等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对于研究陵寝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也为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汉代以降各个历史时期的一般墓葬的发掘,数量更是惊人。大量墓葬的清理及相关的墓葬考古研究,丰富了相关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资料,促进了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历史研究,起到了考古补史、证史的作用。

北京地区的历史时期考古以实物资料串联起了北京历史发展的链条,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北京城市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水平,不断地为我们对北京古代社会不同阶段城市发展的认识增加新的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北京社会发展史的历史文化内涵。

北京考古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与反思是北京考古工作者的职责与义务,及时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北京考古工作的发展过程,同时也能在回顾与前瞻、反思与总结中不断明确北京考古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织编写了这部十卷本的《北京考古史》,希冀对北京考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为促进北京考古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本书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集体研究成果,并拥有全部著作权。宋大川作为主编,做了策划、组织和审稿工作;夏连保作为副主编,协调了本书的编写事务;史前卷由郭京宁著,夏商周卷由张智勇著,东周卷由王继红著,汉代卷由胡传耸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由董坤玉著,辽代卷由于璞著,金代卷由丁利娜著,元代卷由孙勳著,明代卷由李永强著,清代卷(上)由朱志刚著、清代卷(下)由张中华著。

本书史前卷由吴加安先生审稿,夏商周卷由赵福生先生审稿,东周卷由靳枫毅先生审稿,汉代卷由信立祥先生审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由乔梁先生审稿,辽代卷由齐心先生审稿,金代卷由陈平先生审稿,元代卷由魏坚先生审稿,明代卷由荣大为先生审稿,清代卷由李建平先生审稿。

特别要感谢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先生奖掖后学,欣然为本书作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先生大义,吾侪铭刻于心。

诚然,《北京考古史》的编写只是个初步的尝试,不足之处很多,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讨论,我们真诚地希望抛出这块粗砖,引来众多有识之士的美玉,从而快速推进北京考古研究的发展。

宋大川

二零一二年五月

目 录

序·····	张忠培 (1)
前 言·····	宋大川 (1)
第一章 概论·····	(1)
第二章 北京地区东周时期的燕文化遗存·····	(8)
一、北京地区春秋时期的燕文化遗存·····	(8)
二、北京地区战国时期的燕文化遗存·····	(18)
第三章 东周时期的玉皇庙文化·····	(63)
一、前期发现·····	(65)
二、提出课题的经过·····	(66)
三、开展专题考古调查与选点发掘·····	(68)
四、葫芦沟墓地·····	(69)
五、玉皇庙墓地·····	(93)
六、西梁堽墓地·····	(153)
七、三处墓地的文化性质与差异·····	(160)
八、龙庆峡龟山东坡墓地·····	(162)
九、玉皇庙器物群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特点·····	(166)
一〇、关于玉皇庙文化的提出·····	(168)
一一、玉皇庙文化的社会性质·····	(171)

一二、玉皇庙文化的族属问题·····	(173)
一三、玉皇庙文化艺术特征·····	(175)
十四、玉皇庙文化与燕和中原文化的关系·····	(185)
十五、关于玉皇庙文化的源流问题·····	(195)
十六、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	(197)
十七、军都山考古的学术价值及意义·····	(201)

插图目录

- 图一 东周时期燕与周邻文化形势图····· (3)
- 图二 镇江营与塔照遗址商周第四期第三段第四组遗存袋足鬲····· (10)
- 图三 镇江营与塔照遗址商周第四期第三段第四组遗存燕式足跟鬲····· (11)
- 图四 丁家洼遗址一期 I 段陶器····· (13)
- 图五 丁家洼遗址一期 II 段陶器····· (13)
- 图六 丁家洼遗址二期陶器(之一) ····· (14)
- 图七 丁家洼遗址二期陶器(之二) ····· (14)
- 图八 前后朱各庄Y1平、剖面图····· (16)
- 图九 前后朱各庄Y1出土陶器 ····· (17)
- 图一〇 白云观遗址战国陶井底部出土的陶罐及颈部陶文····· (20)
- 图一一 41号井内 II 类、IV 类井套置关系及层位遗物分解图····· (21)
- 图一二 广安门外桥南出土饕餮纹半瓦当····· (21)
- 图一三 宣武韩家潭出土饕餮纹半瓦当····· (21)
- 图一四 怀柔城北东汉墓出土铺地砖上的隶书铭文····· (24)
- 图一五 燕中都窰店古城平面实测图····· (26)
- 图一六 房山窰店城址出土的战国时期遗物····· (27)
- 图一七 房山长沟古城遗址位置图····· (30)
- 图一八 镇江营与塔照遗址商周第五期陶器····· (32)
- 图一九 镇江营与塔照遗址商周第五期陶器与铁器····· (33)
- 图二〇 南正遗址第一期早段遗存出土的瓦当(1~3)和第一期晚段遗存出土的陶钵(4、5)形制特点 ····· (35)

图二一	南正遗址第一期遗存早、晚段典型器物比较图	(37)
图二二	房山黑古台遗址出土兽面纹半瓦当	(38)
图二三	怀柔城北墓地出土夹砂红陶鬲与釜	(40)
图二四	怀柔城北墓地出土泥质灰陶鼎	(41)
图二五	怀柔城墓地出土泥质灰陶豆	(41)
图二六	怀柔城北墓地出土泥质灰陶壶	(42)
图二七	怀柔城北墓地出土青铜带钩	(43)
图二八	顺义龙湾屯出土青铜器(之一)	(44)
图二九	顺义龙湾屯出土青铜器(之二)	(44)
图三〇	通县中赵甫出土青铜器(一)	(45)
图三一	通县中赵甫出土青铜器(二)	(46)
图三二	昌平松园战国墓朱绘陶礼器	(46)
图三三	贾家花园战国墓出土的漆器和铜器	(47)
图三四	房山岩上墓地出土器物	(48)
图三五	亦庄西环南路M6出土器物	(49)
图三六	海淀八里庄瓮棺复原图	(51)
图三七	昌平张营瓮棺墓及葬具	(51)
图三八	房山岩上墓地瓮棺墓及葬具图(之一)	(52)
图三九	房山岩上墓地瓮棺墓及葬具图(之二)	(53)
图四〇	房山岩上墓地瓮棺墓及葬具图(之三)	(53)
图四一	房山岩上墓地瓮棺墓及葬具图(之四)	(54)
图四二	房山岩上墓地瓮棺葬具陶釜、陶瓮形制特点	(54)
图四三	延庆西拨子窖藏铜器	(65)
图四四	玉皇庙文化遗存分布图	(69)
图四五	葫芦沟墓地墓葬分布图	(70)
图四六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夹砂系陶器	(76)
图四七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泥质系陶器(一)	(77)
图四八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泥质系陶器(二)	(77)
图四九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夹砂褐陶指甲纹双耳三足罐早晚型式发展变化趋势图	(78)
图五〇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之一)	(79)
图五一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之二)	(79)
图五二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之三)	(79)
图五三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的青铜削刀(一)	(80)
图五四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的青铜削刀(二)	(81)

图五五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的青铜削刀(三)	(81)
图五六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青铜削刀(四)	(82)
图五七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青铜牌饰	(84)
图五八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青铜带钩	(85)
图五九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尖首刀币柄形坠饰	(86)
图六〇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尖首刀币	(87)
图六一	葫芦沟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砺石	(88)
图六二	玉皇庙墓地墓葬分布图	(95)
图六三	YYM18墓葬形制、墓内积石及上层殉牲平、剖面图	(103)
图六四	YYM18下层殉牲平、剖面图	(104)
图六五	YYM2平面图	(109)
图六六	玉皇庙YYM250随葬品陈放位置	(110)
图六七	玉皇庙YYM174随葬品陈放位置	(111)
图六八	玉皇庙夹砂红陶罐颈部纹饰	(111)
图六九	玉皇庙墓地夹砂系陶罐 I ~ IX型形制特点	(112)
图七〇	玉皇庙墓地夹砂系陶罐 I ~ XIV型形制特点	(114)
图七一	玉皇庙墓地泥质系陶罐 I ~ VIII型形制特点	(115)
图七二	玉皇庙墓地泥质系陶罐 X ~ XIV型形制特点	(116)
图七三	玉皇庙墓地出土泥质灰陶 I型高颈鼓腹壶	(117)
图七四	玉皇庙墓地出土泥质灰陶 II型高颈圆折肩壶及 III型高颈折肩壶	(117)
图七五	玉皇庙墓地出土泥质灰陶 I型豆及泥质黑、褐陶 I型、II型孟	(118)
图七六	玉皇庙墓地出土金饰品	(121)
图七七	玉皇庙墓地出土中原式青铜礼器(一)	(122)
图七八	玉皇庙墓地出土中原式青铜礼器(二)	(123)
图七九	玉皇庙墓地出土铜鍍	(123)
图八〇	玉皇庙墓地出土青铜戈	(124)
图八一	玉皇庙墓地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一)	(124)
图八二	玉皇庙墓地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二)	(125)
图八三	玉皇庙墓地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三)	(125)
图八四	玉皇庙墓地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四)	(126)
图八五	玉皇庙墓地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五)	(126)
图八六	玉皇庙墓地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六)	(127)
图八七	玉皇庙墓地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七)	(127)
图八八	玉皇庙墓地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八)	(128)
图八九	玉皇庙墓地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九)	(128)

- 图九〇 玉皇庙墓地出土青铜马衔····· (131)
- 图九一 玉皇庙墓地出土 I 型青铜削刀····· (132)
- 图九二 玉皇庙墓地出土 II 型青铜削刀····· (132)
- 图九三 玉皇庙墓地出土 III 型青铜削刀····· (132)
- 图九四 玉皇庙墓地出土 IV ~ VIII 型青铜削刀····· (132)
- 图九五 玉皇庙墓地出土 IX ~ XI 型青铜削刀····· (133)
- 图九六 玉皇庙墓地出土 X III ~ X IV 型 I ~ III 式青铜削刀····· (133)
- 图九七 玉皇庙墓地出土 XII 型和 X IV 型 IV ~ VIII 式青铜削刀····· (134)
- 图九八 玉皇庙墓地出土 I 型 I ~ III 式和 II 型 I ~ III 式青铜牌饰····· (138)
- 图九九 玉皇庙墓地出土 II 型 IV ~ V 式和 III 型 I ~ II 式以及 IV 型青铜牌饰····· (139)
- 图一〇〇 玉皇庙墓地出土青铜带钩(一)····· (140)
- 图一〇一 玉皇庙墓地出土青铜带钩(二)····· (141)
- 图一〇二 玉皇庙墓地出土青铜带钩(三)····· (141)
- 图一〇三 玉皇庙墓地出土青铜带卡(一)····· (142)
- 图一〇四 玉皇庙墓地出土青铜带卡(二)····· (143)
- 图一〇五 玉皇庙墓地出土青铜带钩····· (144)
- 图一〇六 玉皇庙墓地出土尖首刀币····· (145)
- 图一〇七 西梁垆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青铜礼器····· (157)
- 图一〇八 西梁垆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 (158)
- 图一〇九 西梁垆墓地玉皇庙文化墓葬出土青铜车马具····· (158)
- 图一一〇 玉皇庙文化动物纹(之一,虎纹)····· (177)
- 图一一一 玉皇庙文化动物纹(之二,野猪纹、熊纹、鱼纹、牛纹、鸡纹、鸭纹)····· (177)
- 图一一二 玉皇庙文化动物纹(之三,鹿纹)····· (177)
- 图一一三 玉皇庙文化动物纹(之四,蛇纹)····· (177)
- 图一一四 玉皇庙文化动物纹(之五,龙纹和蛙纹)····· (178)
- 图一一五 玉皇庙文化动物纹(之六,鹤纹、豹纹、龟纹、狗纹、象纹、狼纹、蛤蜊纹)····· (178)
- 图一一六 玉皇庙文化动物纹(之七,鸟纹)····· (178)
- 图一一七 玉皇庙文化动物纹(之八,马纹)····· (178)
- 图一一八 玉皇庙文化动物纹(之九,羊纹)····· (179)
- 图一一九 玉皇庙文化动物纹(之一〇,兽纹)····· (179)

第一章 概 论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至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山东六国全部灭亡，秦始皇统一天下，这一时期史称东周。东周又分作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称作“春秋”（前770年至前476年），后一阶段称作“战国”（前475年至前221年）。

较西周时期而言，东周时期社会十分动荡。随着宗周的灭亡，东周王室的权威日渐衰微，不但已失去控制诸侯的力量，而且已无力禁止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各方诸侯纷纷争夺别国国土和人民及财物，为此不惜倾尽全部国力对外频繁地发动兼并战争。到东周末年（前5世纪末），除东周王室以外，原有的一百四五十个诸侯国，只剩下晋、楚、齐、秦、越五大国和鲁、宋、郑、卫等几个待亡的小国。

春秋时期偏于北方燕山之野的燕国，国力较齐、楚、晋、秦、越几个诸侯大国弱小很多，因其地处中原与北方交通枢纽之间，这里又是华夏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畜牧部族频繁接触或杂处之地。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駝、驴、羸、馱騊、騊駼、騊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1]北方少数民族不断骚扰燕国，抑或进行边贸往来及文化交流，甚至还越燕而伐齐^[2]。燕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4年），山戎又一次侵燕，“燕告急于齐”，请求齐师救援，于是便发生了“齐桓公为救燕而北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的故事^[3]。燕国经常遭受来自北方游牧部族的侵伐和掳掠，因此在整个春秋时期其国力一直十分衰微，非但不在华夏诸侯大国之列，即使与鲁、宋、郑、卫等小国相比，其国力也相形见绌。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燕召公世家》结束语时，曾作过如此评述：“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4]因此，这一时期的燕国从未被诸夏重视。史籍中关于春秋时期的燕国及其北邻各部族事迹的记载均十分简约，故人们无法从史学领域获得有关春秋时期燕国及其北方游牧部落的更多或更具体

[1] 司马迁：《史记》一百一十卷《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2879页。

[2] 司马迁：《史记》三十二卷《齐太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1483页。

[3] 司马迁：《史记》三十二卷《齐太公世家》、三十四卷《燕召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1488、1552页。

[4] 司马迁：《史记》三十四卷《燕召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1561-1562页。

的知识。这样,人们就希望能从考古学领域做些工作,使得春秋时期燕国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面貌能够多少清晰一些。

新中国成立以后,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市文物工作者就在北京地区开展过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物普查,1984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文物普查,在这期间还配合工农业基本建设做过一些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不少东周时期的燕文化遗迹和文物,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战国时期,而罕有春秋时期燕文化的遗存,更未发现或识别出属于春秋时期燕国北邻的遗存。

北京是春秋时期燕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中心,燕国的都城上都蓟城就建于北京。在北京地区及城郊或郊区范围内,理应有春秋时期燕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尽管北京这片土地已历经了两千七八百年的沧桑变迁,但属于春秋时期燕都蓟城的历史信息和有关那一时期的燕文化遗迹与遗物,应不会在整个北京地区范围内完全消失和绝迹。同样,若司马迁所著《史记·匈奴列传》和《燕世家》中有关北方游牧部族的居地、习尚及其与燕的关系等事迹属实的话,那么在北京的北部山区,即所谓“燕北”之野,似也应该找到一点当时曾颇为繁盛和强势的北方游牧文化的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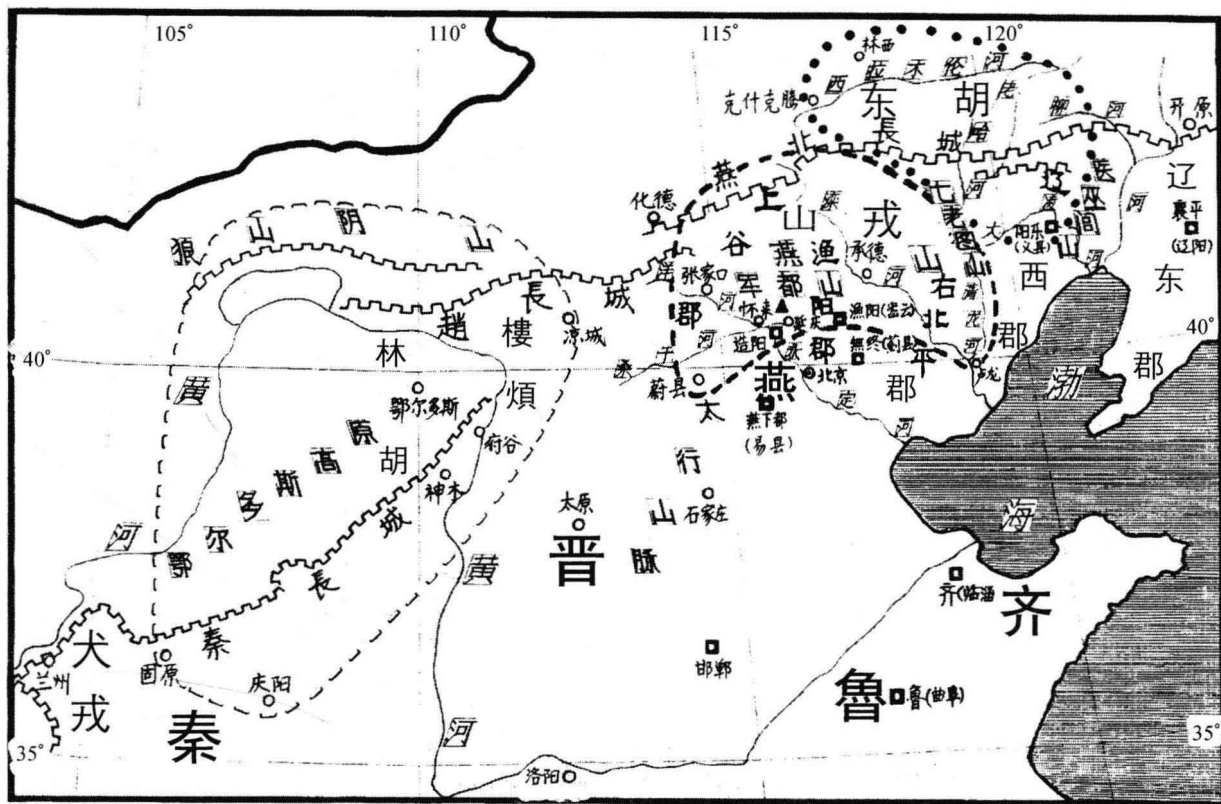
对燕上都蓟城的探寻,北京考古工作者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曾予以关注并做过调查与试掘,但迄今未果。春秋时期蓟城遗址的确切位置,至今未有落实。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局限,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北京地区燕北游牧部族的专项考古,一直处于空白状态。

1985年,北京市文物局正式筹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从此北京市考古工作出现了开拓发展的新局面,步入了一个有科学规划和专题目标并主动开展考古工作的新阶段。

1985~199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承担完成了北京地区基建考古任务的同时,为了解决学术问题,又主动而有计划地开展了四项考古课题:即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延庆军都山东周时期墓地的发掘、房山区拒马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文化遗存的调查与发掘,以及房山金陵的调查与局部试掘。这四项考古课题的开展,在北京地区考古史上是空前的,其成果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

其中1986~1990年,在房山区拒马河流域发掘的镇江营与塔照遗址中,发现了属于春秋早期和战国早、中期的燕文化遗存;1985~1991年在延庆军都山的调查与发掘中,则找到了属于春秋早期——战国早期的玉皇庙文化的部落墓地。这两项考古成果,在北京地区先秦考古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它清楚地表明,北京地区在春秋、战国之际,确实存在着两种文化,即一个是代表农耕文化的燕文化,而另一个则是代表北方游牧和畜牧文化的玉皇庙文化。这两种文化文化性质差异明显,内含特征迥然不同,分布地域有南、北之别,燕文化分布在居庸关以南的南部平原地域,玉皇庙文化则分布于八达岭以北的北部山区,即延庆的军都山及其迤北更深远的冀北山地一带(图一)。

属于春秋时期的燕文化遗存,除房山区镇江营、塔照遗址之外,还见于近几年在房山区城关镇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而发现和发掘的丁家洼遗址,在这里发现了一些东周时期的灰坑和灰沟,遗存年代约为春秋中、晚期至春秋、战国之际。在此次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中,还在房山区城关镇的前后朱各庄村发现并发掘到属于春秋中晚期的陶窑一座(朱各庄Y1)。



图一 东周时期燕与周邻文化形势图

从迄今已发现的情况看,北京地区属于春秋时期的燕文化遗存发现的数量还很少,内涵比较简单,分布地域也显得十分局限,仅限于房山区范围内的3处地点。尽管如此,现已发现的这3处属于春秋时期的燕文化遗存,对于研究春秋时期燕文化的基本特点,也具有奠定基础的意义,它不仅为后来者积累了一份经过科学发掘的有价值的实物资料,而且还提供了继续探讨这一领域相关问题的某些线索,相信燕文化遗存不仅仅局限于房山范围内。随着北京地区考古事业的发展,在北京市其他地点,即北京城区或其他郊区县更大范围中,一定还会有更多属于春秋时期的燕文化遗存被不断发现并揭示出来。

北京地区属于战国时期的燕文化遗存,自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进行首次文物普查时就有发现;至20世纪60~70年代,为配合工农业生产建设,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又做过一些考古清理与发掘工作;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又在房山区拒马河流域进行过专题考古调查,并在镇江营和塔照遗址发现有属于战国时期的遗存,另外还在窦店对战国时期的燕中都城址作了勘探与试掘工作;至21世纪初,为了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又在房山区长沟镇一带作了相应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发现了属于战国时期的南正遗址和岩上墓葬区等。

经过北京市考古工作者半个世纪的努力,北京地区战国时期的燕文化遗存不但在发现数量上较春秋时期者有显著地增多,而且在遗存种类方面也变得丰富起来,已包括城址、遗址、墓葬、窖藏等多种类型;在分布范围方面也有显著地扩大,至少已涵盖了北京地区15个区县。而春秋